

民俗文化遗产对村落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

——以安徽省绩溪县伏岭村为例

祝文敏 梁玥 常江涛¹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乡村民俗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村庄发展有重要作用。以安徽省绩溪县伏岭村为调研点,以当地一项民俗活动——“舞狮”为研究对象,以村民对活动的参与度、认同度为切入口,从村民交往圈层、村民相互信任度、村民对乡村公共事务参与度、在外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反哺情况四个维度系统分析了民俗文化遗产对村落社会资本的影响。

【关键词】民俗文化 舞狮 社会资本 乡村文化 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G249.27 **【文献标识码】**A

从历史和现状看,民俗文化遗产对乡村地区社会资本的创造与维系有着重要影响。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传承发展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习近平指出,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民俗文化遗产对村落社会资本的影响为主题,以安徽省绩溪县伏岭村的一项民俗活动——舞狮为研究对象,从村民交往圈层、村民相互信任度、村民对乡村公共事务参与度、在外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反哺情况四个维度出发,集中考察民俗文化遗产对村落社会资本的影响。

1 民俗文化与社会资本

乡村社会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落脚点,在其中开展的民俗活动是传统民俗文化的缩影,而任何形式的民俗活动都有一定的功能与价值,否则就是没有生命力的。

首先,民俗文化在文化发展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人们地方性文化认同感的加强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龙生祥在对热贡“六月会”的研究中发现了“六月会”对提高社会稳定和秩序化,增强族群认同感的作用。其次,民俗文化可以作为文化竞争力的一部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传承于乡土日常之中的民俗文化,例如婚丧嫁娶、礼神敬祖等仪式活动,具有稳定性、反复性特征,有利于乡土社会内部家庭、家族的和谐,街邻之间的和谐,干群关系的和谐,乃至村际关系的和谐。张巨斌在对西北花儿会的研究中,指出了花儿会交际教化的功能,并对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产生关键影响。在对关中庙会民俗的考察分析中,杨学军指出了其连结社交网络,紧密人与人、村与村之间联系的作用。另外,民俗仪式活动的会头、组织者,以该类活动为资源,以强化乡土社会中的公共领域为手段,充当了乡村权力机构与广泛民意之间的“经纪”,对乡村政治权力机构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强化了乡土社会中的凝聚力。

基金项目:本文系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项目“新农村建设中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7DH12)的阶段性成果;南京农业大学2018年“校级SRT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828A06),指导老师季中扬教授。

作者简介:祝文敏(1997-),女,浙江绍兴人,本科生。

而关于社会资本，本文从宏观层面进行探讨。宏观上，社会网络中那些表现为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的特征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但社会资本是一个被抽象出来的概念，国内外学者对其具体内涵持不同观点。帕特南和福山将公民参与、社团组织、信任等因素列为社会资本的主要指标；洛克纳等人指出了集体效能、社会归属感、邻里互动、社会凝聚力等一系列与社会资本重叠的概念；奥尼克丝等人认为，社区参与、社会能动性、信任和安全、亲友间的联系都包括在社会资本内；而纳拉杨等研究者又补充了日常社交、社会支持、志愿主义等要素。在国内学者的实践中，张文宏提到，在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时，通常分为几个基本的结构面向，分别是信任、公共参与和社会连接、社会网络结构、社会规范等。桂勇、黄荣贵构建了 7 个社会资本测量维度，他们包括参与地方性组织、信任互惠、志愿主义、社会支持、凝聚力、归属感，并指定了 29 项测量指标。

综上所述，新时代背景下，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体现在文化、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在促进文化发展、创造经济效益、促进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联系社会资本的内涵可以发现，如果这些作用被合理提炼，均可纳入社会资本的体系范围内，从而看到探讨两者关系的前景。

区域社会资本显现的是该区域所享有的整体性发展资料，联系区域特有的民俗文化，便能反映出当地独特的发展潜力。所以，将民俗文化和区域社会资本联系在一起，不失为一个充满实际意义又独特的视角。参考相关文献后，笔者结合对伏岭村的考察，将该地民俗文化功能体系化，将舞狮对该村社会资本的影响划分为四个层面，并逐一进行分析。

2 舞狮的概念及其开展形式

舞狮起源于镇邪除恶，南北宋交替之际，邵氏先人定居伏岭，然人定不旺，村人便请来地理师赖文俊，赖文俊造出一个“狮”字，并画出其图形，以驱石狮子虎，从此邵氏将正月十五定为舞狮日。明朝中叶，伏岭人丁兴旺，但村中常发生火灾，村人认为石狮子虎仍在作恶，便用布将“狮”实体化，由两个年轻人套入“狮”身，跳跃猛扑向石狮子虎示威，并将该活动定为“舞狮”，每年元宵举行。清朝乾隆年间，徽剧盛行，伏岭人舞狮后，余兴未尽，就表演徽剧，这样便形成了舞狮、火把游行、演戏三者合一的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三项内容发生了改变，一是舞狮跳狮改在正月初三，并跳到各家各户驱邪求福，收取狮金；二是火把游行演变为游灯；三是徽剧演员规定由十五岁以下的男童担任。

作为一项全村人都参与的大型活动，舞狮的开展有一套切实可行的规制。一是组织者由当年的三十岁男子（现在也加入女子）担任，以接力的方式把全村所有人都纳入舞狮活动中；二是活动资金有两套筹集方法，其一是正月初三跳狮人员到各家跳狮，每家自愿出钱，称为狮金，其二是其他生活上的开支都由三十岁值年承担。三是徽剧演员均为十五岁以下孩童，同样以接力的方式保证演员力量不断更新。

3 舞狮回对伏岭村社会资本的影响分析

3.1 村民交往圈层

从村民交往圈层看，舞狮有一套专门的管理方法，能够让每个村民参与其中，起到了连结社交网络，紧密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作用。

舞狮的筹备周期很长，参与人员涵盖不同年龄和性别的村民。三十岁值年是舞狮的关键人物，承担了舞狮所有的组织工作。以往，三十岁值年从二十九岁的正月十七便开始接管所有工作：十月半，邀请相关人员聚餐，商讨次年事宜；腊月边，搭建戏台，开始排演；正月初三，做好一切演出前的工作。四天演出完毕后，次日公布当年收支清单，工作便结束了，由下一年的值年接任。三十岁值年看似是自己在出钱出力，实则倚靠的是他背后的整个家庭。演戏的人都是伏岭七到十五岁的儿童，阴历十月半到正月半的三个月为学习时间。筹备过程中，还需要有资历的导演、乐队、检场以及化妆人员，他们都是舞狮的骨干力量。

在活动筹备过程中，每个参与人员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三十岁值年负责统筹活动的进程，与每个活动参与者沟通交流，在同一舞台上，导演、乐队、检场、化妆、演员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也不可缺少。在办好活动的共同目标下，通过日复一日的沟通与磨合，村民经历了从未曾谋面到略有了解，从点头之交到有更深层次交往的过程。

由于三十岁值年是舞狮活动的主要力量，对活动的参与程度也比其他人更深，不仅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多，而且需要广泛地与他人沟通，所以，笔者以调查中收集的问卷数据为基础，做了分析。

在 70 名参与过三十岁值年的人当中，有 23 人表示自己认识村中比较多的人，有 30 人表示村中的人自己都认识，两者合计 53 人，在参与过值年的人中占比为 75.7%，在 77 名没有参加过三十岁值年的人当中，有 48 人表示自己只认识很少一部分人，加上表示基本上都不认识的 2 人，合计 50 人，在没有参与过值年的人中占比为 64.9%，参与过三十岁值年的人普遍认识村中比较多的人，而没有参与过三十岁值年的人对村中人的熟识程度是比较低的，参与过三十岁值年的村民，其社会交往圈层会得到扩大，从整个村落范围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不断有新的三十岁村民卷入更大的个人社会交往圈层中，从而让村民间交往关系不断连结与重复，使村民间的关系得到加深与巩固。

舞狮正式开始时的村民参与度也很高。先是游灯时，游灯队伍会按照规定路线，绕村中主要街道游行一圈，每家门口都要经过，此时，村民都会在路边观看，队伍经过时，老老小小都会加入其中。接着是演戏，游灯结束后，人流被带领到戏台下，徽剧表演开始，此时热爱徽剧的老人和赶热闹的小孩都簇拥在戏台下，热闹非凡。

以上这种活动模式保证了村中的每个人都能切实参与到活动中，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够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舞狮在伏岭年年举办，具有稳定性和反复性的特征，这也为参与其中的村民提供了一个可以稳定、反复交往的场所和得以持续沟通的主题，在多年累积下，村民间的交往圈层不断积累和扩大，村民自幼便参与到村庄公共文化活动中，与其他村民沟通互动，将各个村民看作一个个连结点，整个村庄的村民交往圈层便显得更加密集与牢固。

3.2 村民相互信任度

帕特南指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要素，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信任。而一个村落社区的信任亦是建立在某种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并形成于持久、重复的村民互动之中的，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和在此基础上的互动，信任就无法建立。

通过分析发现，伏岭舞狮使村落的社会关系网络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加强，村民间的沟通与交流不断加深，村民间的信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为了展示村民间的互相信任程度，笔者做了表格。

在 147 名调查对象中，有 24 人认为村里的人可以信任，93 人认为村里的人可以信任，但有部分需要小心，两者相加合计为 117 人，在总调查人数中占比 79.6%，说明伏岭人对其他村民的信任程度是比较高的，而舞狮对这种普遍信任的影响正是需要分析的。

如果说舞狮的组织形式为村民的交往提供了基础，那这种周期性的合作交往便是村民间信任提升的动力与源泉。

作为一项群众性活动，舞狮在开展的过程中就逐步培养了村民间的信任。例如活动资金的收取与保管，三十岁值年能成功去各户收集“狮金”，就需要村民对活动组织人的充分信任，三十岁值年分摊的经费能交由领头人支配也体现了这一点，而这份信任是产生于历年的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舞狮活动历时近两百年，未曾在经费和人员分工上出现过较大的差错，各方参与者可能彼此陌生，但仍各司其职，戏文的教授由老艺人与学校负责，后勤工作由三十岁及其家属安排，仅仅有条，村民间的信任也就在潜移默化中增长。通过频繁的交往互动，村民交往圈层不断重复与扩大，村民间信任度就得到了显著

的提高。

而对于三十岁值年，舞狮对他们信任的提升更为显著。三十岁之后，同年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三十岁值年做完后，同年便各自在今后的生命历程里扮演着异性兄弟的角色。逢上三十五岁、四十岁这样的年份，便会挑个日子，带上妻儿聚会吃饭。站在异姓兄弟的角度上，同年家中的红白喜事也成了自己的大事，每到这样的日子，同年都会相互帮忙。不得不说，舞狮活动中这一不成文的规定，对村民中的同年群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一规范下，同年之间的交往模式发生了改变，三十岁之前，他们可能只是彼此的同级同学，但三十岁之后，随着同年间彼此交往的不断加深，同年之间的信任也得以建立和加强，不仅是同年之间，这种交往和信任甚至扩大到同年背后的整个家庭。值得提出的是，三十岁值年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时间，每个人都在三十岁要做值年的文化背景下成长，也就是说，伏岭村的每一个人都会因为做三十而和别的三十岁同年建立起一种彼此信任、互助的关系，起先可能是被动的，是被舞狮活动中的某一不成文规范所规定的，但随着后来彼此间情感联系的加深，信任便悄然而来。

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都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这样的社会资本能够使得遵守规范的人解决他们在公共性事务中遇到的问题，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参与网络是相互加强的，他们对于自愿合作的形成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都是必不可少的。

3.3 村民对乡村公共事务参与度

147 名调查对象对义务帮忙舞狮活动的乐意程度，在 147 名调查对象中，有 140 名调查对象对义务帮忙是乐意的，占比 95.3%，其中有 68 名调查对象持比较乐意的态度，占比 46.3%，72 名调查对象持非常乐意的态度，占比 49.0%，由此可见，伏岭村村民对舞狮活动的认同程度是非常高的。

在前文的分析中，笔者得出舞狮活动作为一个让村民保持稳定、反复的交往互动的场所，扩大加强了村民间的交往网络，并让身处其中的村民间的信任得到加深。一方面，村民间的交往网络和信任成为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的基础；另一方面，村民由于参与舞狮活动，在舞狮文化的熏陶下所产生的对村落文化的认同感，则是村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原因。

结合伏岭村的历史与现状，笔者将该村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分为两个层面，即文化性事务层面和社会性事务层面。

伏岭村村民对村庄公共文化事务的参与是普遍和深入的。舞狮本身作为伏岭村一项村民参与度最广的文化活动，延续了百余年，村民的集体参与在这种持久的传承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资金上，每年各家都会准备“狮金”为活动的开展奉献自己的力量，三十岁值年承担活动的大部分费用，2018 年春节全村 28 名值年出资共计 4 万余元。以外，伏岭村民对舞狮文化事业的其他贡献也比比皆是。民国年间，伏岭旅外发展徽菜馆业者，每年回家都带回新剧本、新唱腔、新的戏服和盔头，为舞狮注入新的血液。村民自发组织“鸡鸣寻声社”，让村中的文艺爱好者聚集在一起，讨论表演艺术，丰富村庄文化事业。在村民的自发行动下，伏岭戏台经历了三次改建，最后一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人成立建台委员会，共捐资 9882 元。如今的伏岭小学徽剧班，由老艺人担任指导老师，每周教授徽剧，聘金微薄。伏岭小学的徽剧小演员们，也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学习徽剧，让徽剧得到传承。可见，伏岭村民为村庄的公共文化事务做出的贡献不可小觑。

在社会性事务的参与上，伏岭村有优良的历史传统。早在清朝嘉庆年间，由于村中水源缺乏，村民便在村中开凿水井，平均十几户人家就有一眼水井，村民自己动手解决了饮用水之难。村民们还合力开渠将小溪水引入村中，供日常生活洗涤之用。同时，村中石板路的修建也聚集了村民的力量，道路平坦便于行走，形成了有名的村境村容。此外，村民还成立了自组织“桥会”，若有木桥在大雨过后被冲倒，便负责搭桥，方便交通。此类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大部分村级公共事务逐渐为政府部门接管，虽然村民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依旧，但可以发挥的空间受到了限制，村民对于村庄社会性事

物的参与程度有所下降。虽然如此，在 2004 年到 2007 年这四年中的三十岁值年，认为三十岁是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应该为村民办实事，经过协商，承担了村内全年的路灯费用。同时，值年们还保持着为徽剧童子班提供物质支持的传统。并且，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值年们普遍表示，一旦有任何需要，他们定会为村庄奉献自己的力量。

3.4 在外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反哺情况

在伏岭，很多不在村里成长的人，三十岁仍要回村参加值年仪式，甚至还有在伏岭定居的他姓者，与当地的三十岁一同值年。可见人们不光积极参与舞狮，更是把它当作了表达对村庄认同与热爱的载体。在舞狮文化下出生与成长的村民，“做三十”已是他们深入骨髓的基因，舞狮是他们别样的乡愁，在此文化背景下，村中的旅外人士对村庄各方面进行了反哺。

民国年间，幼时受过舞狮熏陶的出门客，经常出入戏院，带回新的剧本和表演技巧，积累了一定经济基础之后，便为舞狮添置新的戏衣与道具。例如，村民邵家湖专门去长春上海学戏，并带回一台留声机，导演的节目也让村民耳目一新。抗日战争时期，戏台需要改建，在上海工作的村民依照上海天蟾舞台样式设计样板，为戏台改建提供宝贵参考。上世纪 40 年代，在上海经营菜馆业的邵友萍，看到伏岭小学教师墙壁开裂，就向学校提出暑假期间修缮教室的建议，并承担了所有费用。还有旅沪医师邵亦群，他说：“我爱舞狮，我爱故乡，它留给了我一个美好童年的回忆。”他给小学赠送书籍共 520 多册。在七八十年代的戏台改建中，在黄山担任建筑工程师的邵之江也承担了设计部分的工作。这些旅外人士对家乡的热情，都与舞狮文化密不可分。

历年来，在外打工的三十岁值年持续为舞狮事业提供资金与物资支持。2018 年春节，伏岭村共有 28 名三十岁值年，其中有一人与父母同住伏岭，一人患有精神障碍，其余 26 人均在外打工，当年正月初四，参与做三十岁的人数为 28 人，其中三人为父母代做。每个三十岁值年都没有落下舞狮这项重大的活动，即使自己有特殊情况，也会让家人代做，这体现了伏岭村民对做三十的高度重视。同时，2018 年伏岭村 28 名三十岁值年共筹资四万余元作为舞狮资金，活动结余都作为徽剧童子班的活动资金。2004 到 2007 年这四年中的三十岁值年，尽管都在外打工，但约定农历二十八全部到家，商讨舞狮事宜，舞狮当天台下观众近千人。并且，他们经过商讨，筹资约 3000 元，承担了村内全年的路灯费用。除三十岁值年外，还有其他旅外人士为村庄提供不定期支持。旅京人士邵宗有，每每收到兄长拍摄的舞狮视频都不禁热泪盈眶，为感恩家乡滋养之情，他在伏岭村设立远方助老金，并成立理事会，每年为贫困老人发放补助金，并在重阳节向老人赠送生活用品。同时，他每年为伏岭小学困难学生提供十万元助学金，已连续资助 4 年。

在伏岭人看来，他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就是回报家乡，而回报家乡的源泉就是他们对于自己伏岭人身份的认同感，邵氏家族世代在伏岭生存，伏岭的风俗和山水养育了他们，而舞狮作为伏岭独有的活动，起到了区别伏岭和他村的作用，也是伏岭乡愁所在，倘若伏岭某年不再游灯、不再跳狮、不再唱戏，乡愁就没了寄托，在此基础之上的文化认同便会渐渐失落，人心便散了。

4 结语

总的来说，舞狮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伏岭村社会资本产生了影响。

首先，舞狮在伏岭创造了一个以稳定性和重复性为特征的场域，为村民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基本条件。站在各自的角色地位上，许多年龄各异的男女联系起来，使整个村庄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创造一种潜在的社会资本，以便在需要时对其进行调动。

其次，村民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出生与成长，在不断密集的社会参与网络中，通过彼此间的互动与交往形成普遍的互惠与信任。

最后，舞狮背后蕴含的文化，作为一种内化于人的力量，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强化了伏岭人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村民对于村落公共事物的高度参与是其对村落文化高度认同的表现，在这种文化下出生与成长的村民，对村落的归属感会逐渐加深。现今，伏岭村民一到三十岁，无论男女，都要回乡值年，让大家认同自己是伏岭的一分子。几百年来，“做三十”已经深入伏岭人的骨髓，成为获得认同感的一种仪式。不光是做三十岁，每年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民俗活动：游灯、舞狮、唱戏，都在伏岭人心中结成了文化认同最基础的部分。舞狮文化年复一年地作用于伏岭人，实际上给村民的伏岭人身份起到了一种强化作用，充当了伏岭人个体与村落共同体之间的黏合剂。

表面上，舞狮作为一项大型群众性文化活动，以其特有的组织体系和运作方式，为村民提供了扩大与加强交往圈层的条件，并使村民在后续的交往与互动中提升彼此间的信任，信任反过来又可以加强村民间的交往，这是对舞狮加强伏岭村村落社会资本的表层解释。在此基础上，舞狮作为伏岭村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延续至今，是该村村民对村落文化认同与自身身份认同的外显与表达，对村落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使村庄内部维持着较强的联系，使村民对村落公共事务的参与有着较高的积极性，同时促进在外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反哺，这是对舞狮加强伏岭村村落社会资本的深层解读。而村民间的信任、交往圈层和公共参与也是相互加强的，村民彼此间稠密的交往圈层增加了关系的重复和联系，从而增加信任水平，对村落公共事务的参与合作能够促进信任，信任反过来又可以强化交往网络与促进公共参与中的良性合作。由此可见，民俗文化的传承在乡村现代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从精神层面出发，为村落提供创造与维系社会资本的物质力量与文化力量，并且是广泛而深远的。

参考文献:

- [1] 龙生祥. 热贡“六月会”祭神仪式的民俗功能解读 [J]. 青海社会科学, 2012(03):181-184.
- [2] 张士闪. 温情的钝剑: 民俗文化在当代新农村建设中的意义 [J]. 中国农村观察, 2009(02):76-85.
- [3] 张巨斌, 许吉芬. 简论西北“花儿”的社会功能 [J]. 社会学研究, 2006(03):31-33.
- [4] 罗伯特·D. 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5] 张文宏. 中国的社会资本研究: 概念、操作化测量和经验研究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7(03):148-149.
- [6] 桂勇, 黄荣贵. 社区社会资本测量: 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08(03):122-245.
- [7] 蔡志荣. 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 [J]. 西北民族研究, 2012(01): 208-211.
- [8] 邵茂深. 伏岭舞狮 [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6.